

颠覆林大钦：论潮州歌册《翁万达全歌》的民间话语流动

詹晓悦

摘要：潮州歌册《翁万达全歌》故事中，来自民间的话语形塑了恶官林大钦、英雄谢敬龙，故事张力中隐含着民间话语的矛盾情绪：地方宗族面对封建国家权力干涉时有焦虑、不满与反抗，但在关乎家族的生存中，又对国家有某种程度的依赖。这是因为民间话语的反抗是沉默的，故事文本提供地方宗族与封建国家权力这一对文化关系演化的作用力场，民间话语再现文本生产时的历史环境，还原被主流话语忽视的民间情绪；但这种对现实等级秩序的审视和反思仍受到来自文本外部行政手段的干预，只能将政治话语暂时悬置，代之以劝善因果的主题。

关键词：潮州歌册；林大钦；民间话语；地方宗族；书坊

潮州歌册（简称“歌册”）是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以潮汕方言说唱，讲述婚姻爱情、英雄传奇、宫廷传奇、节女孝妇、神仙精怪等题材的诗体小说，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据肖少宋考证，歌册大约产生于清代初期，盛行于清末民国。它以当地戏曲、歌谣为基础，吸取了弹词、木鱼书、变文、宝卷等外来题材、语言结构，形成了以七言为主（包括三言、五言、三三五等结构）、每四句

作者简介：詹晓悦，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为一组的说唱结构。歌册《翁万达全歌》的相关故事原先在民间口口相传，进而由地方下层文人进行加工整理，形成歌册文本，于20世纪20年代被改编成潮剧搬上表演舞台。^①该故事颠覆了当地先贤林大钦在官方话语中的形象，将其塑造成一个自私蛮横、精明残酷的小人，而历来歌册和林大钦的相关研究却鲜少从地方社会情况探讨这个文学现象。^②

事实上，歌册的作者多来自地方民间，文本中的民间话语区别于官方话语，质朴地传达出当地人的道德观念；同时，民间话语又受文本生产过程中历史环境、行政手段的影响，在文本故事的作用力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在该故事文本成型的过程中，历史真实与否，

① 目前关于歌册《翁万达全歌》的相关研究尚未出现专篇论文，散见于专著与论文中，主要有三个方面。

A. 歌册著录：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录为《翁万达》，归为传奇类故事；薛汕《潮州歌册目》，谭正璧、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 曲海蠡测》录为《翁万达》；林有钊《潮州歌册要目》录为《翁万达》，括号中补“斩十八翰林”；郭马凤《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潮州歌册志·潮州歌册的歌本》录为《翁万达斩十八翰林》；肖少宋在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潮州歌册研究》录为《翁万达全歌》。详见肖少宋：《潮州歌册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B. 版本考察：肖少宋在《潮州歌册研究》考察《翁万达全歌》为潮州王生记藏板，封面实际刊刻为“古板最新翁万达全歌”，有李春记书坊和李万利书坊两个出版商，但均为王生记藏板，现藏于多家图书馆。

C. 故事来源：黄桂烽根据题材来源将歌册分为“改编系”“非改编系”两类，《翁万达全歌》系潮汕当地文人构思创作的“非改编系”，在歌册成书之前，潮汕当地已经有相关的民间传说传播了。肖少宋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潮汕当地已经有根据《翁万达全歌》林大钦故事改编而成的潮剧《林大钦》演出，由此可推出关于林大钦故事载体的发展过程。详见黄桂烽：《如何界定“非改编系”潮州歌册及相关概念》，《汕头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肖少宋：《潮汕戏曲与潮州歌册互动关系探析》，《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李梦捷在《潮州歌册中的翁万达、林大钦形象研究》中注意到《翁万达全歌》中林大钦形象的怪异，并猜测有诽谤、编撰者的主观情感、潮人鬼神观念影响、民间价值观念等原因，但并未从潮汕地区的社会机制进行分析。详见：詹树荣主编，肖少宋著：《潮汕本土题材潮州歌册整理及研究》，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第79—94页。

显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需要被探讨的是，来自潮汕当地的民间话语如何颠覆林大钦形象，又为何颠覆林大钦形象？

一、林大钦：被民间话语颠覆的地方先贤

《翁万达全歌》文本实有三个单元故事，故事发展环环相扣，其中关于林大钦的故事是开篇的第一个故事，叙述嘉靖壬辰年间潮州籍状元林大钦在京都与太后、嘉靖朝堂周旋后，回乡借用国家权力，欲占谢氏祠堂建造书屋不成反被打，回京奏报途中病死的故事。

林大钦（1511—1545），字敬夫，号东莆，潮州海阳县东莆都（今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人。嘉靖十年（1531），19岁的林大钦在府试中取得佳绩，而后又以“均天，择吏，去冗，辟土，薄征，通利，禁奢”^①的策论赢得嘉靖青睐，成为科举社会里潮汕当地唯一的文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国家的官方话语是高度赞赏林大钦的，他因病去世后，不少士大夫都感到悲痛惋惜，为他立传：

论曰：太史之贵也，实出永嘉、贵溪之门。二人既得君，太史又为天子所自取士，倘稍委蛇，即立致卿贰无难也。顾屡促不就，何哉？既盈而昃，亢极而战。无论俯仰事人，非通人之节。而权势倚伏之途，肯蹶裳就之乎！吁！此出处之揆也。既已逍遥林谷，向往前修，生生之体，依稀见之。使天假之年，进取当未可量也。居家奉母，是亦为政。自贱而贵，自生而没，始终孺慕，可谓孝矣。^②

薛侃为林大钦撰写的这篇传记刊刻在光绪十年刻本《东莆先生文

① 许晓云：《林大钦诗文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3页。

② （明）林大钦撰，黄挺校注：《林大钦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

集》卷前，较好地代表了国家正统话语对林大钦的评价。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林大钦少时聪颖，拮据奉母的经历，叙述他在科举中撰写的文章考据翔实关键，言辞凛冽正气，受到了皇帝和各位考官的赞赏，两年后，林大钦以母老病乞归终养，此后便一直隐居东莆山中，聚集族人，为乡里的子弟讲学，随心著作，寄情山水。其间，与他交好的洪震父去世，林大钦亲自为其扶柩，出资扶持洪家；东莆堤坝受损，他便联合乡人加固堤坝，使村子免受洪灾。嘉靖二十四年，林大钦葬亡母，因悲伤劳累过度而逝世，年仅34岁。薛侃认为林大钦是因为受到嘉靖和张孚敬、汪鋐等官场权势的赏识才得以中举，只要他稍微屈从、站队，便可获得顺利仕途，但林大钦对朝堂政局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与权势同流合污，退隐山林，践行儒家孝道，保持灵魂纯洁。其他评价如林大春《东莆太史传》的“瑰奇之质”^①、林熙春《为诸生呈林太史乡贤稿》的“视富贵如浮云，温饱非平生之志；以名教为乐地，庭闱实精魄之依”^②、道光年间《广东通志》的“实能于所性本体，着力修存，优游典籍，怡情山水。所做诗歌，萧然自得”^③等等，都给予林大钦正面评价——在官方话语中，林大钦是敬业好学、兼济天下、正直孝顺、具有乡土情怀、向往冲淡生活的传统士绅形象。

但在《翁万达全歌》中，来自民间的创作者颠覆了林大钦在官方话语中的形象。故事文本采取的是“欲抑先扬”的叙事模式，前后对比。在林大钦与谢氏一族发生祠堂纠纷之前，作者运用不少笔墨叙述林大钦在京中发生的反戴帽子过御街、巧答嘉靖面相题、恭敬接待翁万达三个小插曲。文本中林大钦对这些波澜的平息，足见他的聪明谦恭，但是当故事发展到祠堂纠纷时，前面所塑造的林大钦形象发生了

①（明）林大钦撰，黄挺校注：《林大钦集》，第387页。

②（明）林大钦撰，黄挺校注：《林大钦集》，第388页。

③（清）阮元修，（清）陈昌齐纂：《广东通志》卷294列传26，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

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寻找风水宝地建造自己的房屋前，他懂得先联系地方官说明自己是“奉旨”建宅，需要地方官的支持，借助地方官掌握的封建国家权力实现目的：“长情未禀公祖知^①，在京领有圣旨牌，共吾出示助一力，后日恩德自报还。”^②因谢氏祠堂的风水好，他前往谢氏祠堂与谢氏兄弟交涉，语气傲慢蛮横，“状元就共伊言陈：‘为弟就是林大钦，冲撞贵府无别事，京中奉旨归回临。欲起书斋在潮城，城内择无地方住，见尔祠堂一片地，甚是合我个心情。□□□尔□吾身，祖宗移过别方临，让吾来起做书室，自然感尔大恩深’”。面对林大钦蛮横的态度，谢氏一族的谢敬龙好言相劝，拿出公银让林大钦另择一番地，甚至承诺为林大钦看一处好地，但林大钦仍是不依不饶，搬出皇帝圣旨，要求谢氏一族赶紧搬离，还威胁谢氏一族：

只有贵祠合吾心，莫说就是三百金，封做^③三千吾亦勿，劝尔赶早对众陈。吾是奉旨到只^④来，府县道镇俱皆知，若是逆着圣旨意，下官就去奏金指^⑤，难保贵族得平安。……状元听了大发怒，对床一打将言陈：吾不管尔衰共兴，奉旨谁敢不应承？难道恁就识地好，叫我何处去寻龙^⑥？吾今头先说尔知，若是偏偏不让还，定回府县来捉掠，许时^⑦收悔太迟来！

林大钦语气骄纵霸道，步步紧逼，无奈之下，谢氏聚集族人痛打

① 公祖：地方官徐光。

② 本文关于《翁万达全歌》的文本内容，皆引自潮安府前街王生记：《翁万达全歌》，《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之潮州歌册卷》卷5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下文不再赘述。

③ 封做：即使。

④ 只：这里。

⑤ 金指：金阶，指嘉靖皇帝。

⑥ 龙：指风水宝地。

⑦ 许时：到那时。

林大钦，林大钦气急败坏，回京奏报皇帝准备剿杀谢氏族人。没曾想途中山神发威降灾，林大钦病丧于回京路上。不同于官方话语中的林大钦，《翁万达全歌》的林大钦，是自私蛮横、精于心计、虚伪残忍的，他最后葬身于地方神明所施加的病灾中。在探讨颠覆原因前，我们且看民间话语如何塑造与林大钦产生对立利益的谢敬龙。

二、谢敬龙：民间话语形塑的宗族英雄

（一）“矛盾”的英雄

事实上，林大钦并非文本里的真正主角，在塑造自私蛮横、工于心计的林大钦时，创作者花费更多笔墨刻画谢氏族人的代表“谢敬龙”。文本通过邻居一声“老师”的介绍，安排谢敬龙出场，蕴含了民间话语对该角色的尊敬。他是谢氏家族大房的代表，在纠纷前期是管理族内祠堂的秀才，而后成为这场祠堂纠纷中保护谢氏家族的英雄。

谢敬龙是心系宗族的英雄，在林大钦的强权威慑下，他并没有屈服妥协，而是寻求保全宗族的方法。面对林大钦的“迁族通知”，他立即召开宗族会议商量对策。抓阄时，命运安排他与林大钦交涉。这场关乎全族性命和祠堂香火的交涉，需要勇气与智慧——他先设宴邀请林大钦，解释祠堂对族人的意义，言辞恳切，希望林大钦不要为难谢氏一族，并送给大钦三百两，甚至承诺谢氏族人可以为林大钦另寻风水宝地建造书屋。

同时，敬龙又是敢于挑战尊卑秩序、反抗侵犯的英雄。面对林大钦的步步紧逼，他先在言语上进行反击，痛骂林大钦利欲熏心，声称要将林大钦痛打一顿，再请嘉靖明断是非，“敬龙听言就冷笑：‘既知天子门生尊，这般横行该不该？就是奉着圣旨来，皇上叫尔毁人祖，

全^①尔一样无父爱！吾今专欲打状元，打了全尔朝金銮，皇上殿前去办白，总然受罪口含冤’”——具有宗法观念的皇帝，不会随意毁坏供奉他人祖宗的祠堂，此处谢敬龙痛骂林大钦从小没有父亲，便是痛骂林大钦没有宗法血缘观念，才会轻视祠堂对宗族血缘延续的作用，擅自搬用圣旨欺压地方百姓来达成私欲。谢敬龙不耻林大钦的行为，并号令族人围殴林大钦。在面对强权时，他敢于质疑，为了宗族而反抗朝廷尊卑秩序、痛打朝廷命官，虽是绝境里的无奈反抗，但具有一定的反叛性。

但是谢敬龙的反抗具有局限性，他颠覆尊卑秩序，但最后又通过仕途、依靠封建国家权力来为自己洗刷冤屈，为宗族增添光彩。围殴林大钦后，谢敬龙为了不连累全族，只身前往府衙自首，陈明林大钦对谢氏一族的欺辱，表明自己是无奈之下才做出的反抗。在狱中，他因为好学得到王太爷的赏识，得以和弟弟谢敬祥偷偷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并在嘉靖面前启奏纠纷一事——“敬龙进士上殿中：‘三呼万岁奏君王，微臣有本来起奏，望主将臣罪放双^②……’嘉靖吾主在金指，听他所奏事便知，果真贤孝人敬重，赐乡回家免京骇”。嘉靖认为谢敬龙贤孝敬重，便赐其回乡，免其罪名。谢敬龙痛打林大钦颠覆尊卑秩序的血性，是出于人在面对强权威胁时自保的本能，最后却不得不借助国家权力才得以不受罚。故事最后，祠堂张灯结彩庆祝谢敬龙高中进士与宗族得以延续的结果，谢敬龙用钱银^③感谢禁子的不杀之恩与王太爷的知遇之恩，实际上是地方宗族对封建国家权力的认可与服从。通过将谢敬龙、谢敬祥纳入“礼”的秩序中，封建国家权力赋予了谢氏宗族合法的延续机会：“富户家家送茶仪，铺毡结彩有三

① 全：同。

② 双：指殴打状元与越狱参加科举两罪。

③ 钱银：潮汕方言“银子”之意，原文即为此。

天，鸣罗吹鼓设卓席，六亲四眷来贺伊。一日过了一日间，兄弟拜祖祠堂中，喜得解罪平安福，高车四马进门边。”

民间话语形塑了谢敬龙这样一个矛盾的英雄。他是谢氏宗族中的长房长子，勇敢承担起保护宗族和祠堂的责任，他用勇气和智慧与林大钦周旋，不得已采用暴力逾越了尊卑秩序，挑战林大钦所借用的国家权力。但是谢敬龙的反抗是有限的，他身上透露出来的情感是矛盾的，谢敬龙借助国家权力（在王太爷帮助下越狱）参加科举考试，进入林大钦所在的国家管理人员体系，才能够保全性命、保护宗族。歌册的民间话语在形塑这样一位矛盾的英雄同时，实则上流动着某些被封建时代官方话语压制的情绪，反映了当时潮汕社会的情感与理想。

（二）《翁万达全歌》中的民间话语情绪

《翁万达全歌》中，民间话语作为不同于官方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表述，重新演绎了林大钦所在的历史，将所谓的逸闻趣事纳入到权力运作的文本语境中，颠覆当地先贤林大钦在官方主流话语中的形象。民间话语以“政治解码性、意识形态性和反主流性，实现去中心”^①，并在其中形塑了谢敬龙这一矛盾的英雄角色，通过对其表达认同来抒发情绪。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文字的裂缝，理解谢敬龙的个体思想，捕捉歌册中隐藏的情绪，从而解释文本所呈现的权力结构。

面对林大钦利用国家权力对地方宗族的象征——祠堂表示覬覦时，谢敬龙与弟弟急忙招来族内男子召开会议，语气间非常担心祠堂被毁、族人居无定所：

兄弟就对众人说：“大钦状元到此间，前来担（告知）阮^②兄

①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② 阮：我。

弟听，说伊奉旨到潮城，欲起书斋拴^①无地，见赧^②祠堂合心情，欲赧地方让伊人，叫赧搬祖别外间。官府又共伊出示，兄弟听了伊话言，这是合族大事情，不敢主意自专行，叫伊三天候信息，容吾斟酌大众听。今日请恁众人来，须当设法来安排，不知恁有乜主意，快快商量但说知。”

后文谢敬龙狱中读书，被王太爷发现，向王太爷陈明自己面对林大钦的欺压为何不屈服时，他解释道：“人为祖先理应该，祖公祠堂一旦无，何怕舍命丧南柯，千田万地无了局，生为读书亦是魔。不念先祖共先灵，父母生身恩万重，此遭功劳若不报，哪有后日传香灯。”在谢敬龙的观念里，保护祖宗牌位和祠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应当敬重祖先、感恩父母。从文本谢敬龙所代表的民间话语焦虑来看，可以看出地方宗族面对封建国家权力干涉时所产生的焦虑与危机感。接着，迫于封建国家权力，以谢敬龙为代表的谢氏家族有了短暂的妥协——谢敬龙先设宴邀请林大钦，向他诉说祠堂对宗族的意义，言辞恳切，希望大钦不要为难谢氏族人。但林大钦依然咄咄逼人，谢敬龙被逼无奈，只好唤来族人围殴林大钦，并在语言上对他进行辱骂，这体现了伴随着生存焦虑和危机感，地方宗族对国家权力产生了不满和反抗。

随着故事的发展，为了消解这一份焦虑与危机感，地方宗族不得不投靠国家权力来获得新生。在谢敬龙被收押的时候，发生了两段小插曲，一是其弟谢敬祥取谢氏公银贿赂禁子，才得以探监；另一段事是王太爷在狱中听到谢敬龙读书声，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偷偷将其放归，并赠予盘缠，让他和弟弟参加科举考试为家族洗刷冤屈。而正是这些国家管理人员的帮助，谢敬龙兄弟才得以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沉

① 拴：寻找。

② 赧：我们，我们的。

冤得雪，壮大谢氏家族的力量。在这一民间话语演绎的故事中，宗族最后依靠国家权力的帮助才得以延续，发展壮大。

故事中的林大钦背后也有整个林氏宗族，但由于故事内容侧重其恶行的描写，其家族的影响便淡化了。但我们仍可从林大钦得势和失势的情况来窥探林氏家族的发展状况。当林大钦高中状元时，全族上下均喜气洋洋，整个家族的地位（通过门第的高低体现）也迅速提升：

他母思想喜非轻，未尝道喜人知因，邻近富户来孝敬，暗静^①俱礼来定金。起造府第在乡中，免用出钱来为难，侯府起好来道喜，择日娶妻结全房。族人领命俱安排，去叫泥木理当该，奉旨起造无拦阻，欲对后座先起来。大门一个高如天，欲望田园理当宜，门佃^②欲打二尺二，路格^③如梯好起离^④。高能望远谁不知？望见田园是伊个，一寸王土不敢阻，前畔未起后先来。

相关描写可以看出林大钦高中状元时族人的喜庆；林氏府第规模的扩大，亦可看出这个家族的势力正在壮大。但当林大钦发病身亡时，整个家族也沉浸在悲伤哀悼中，甚至想作法招林大钦之魂回到祠堂中：

合家哭得泪哀哀，收什去引灵魂来，正好来家做功德，府第未好难安排。渐且引来祠堂中，亲人闻知泪汪汪，痛自状元少年丧，祠堂行祭伊一人。

林大钦通过科举考试，全族地位上升，自己也行使封建国家赋予的权力（多次对外称奉旨建宅）欺辱谢氏族人，在歌册文本中，林大钦已经演化为封建国家的代言人之一。谢敬龙、谢敬祥也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获得延续宗族的机会，朝封建国家的

① 暗静：私底下。

② 门佃：门槛、门第。

③ 路格：阶梯。

④ 离：藩篱。

代言人身份演化。谢敬龙在地方上会如何行使自己身上的权力？屠龙的少年是否会变成恶龙？歌册最后并没有继续展开，而是接刘明珠二子征西番的故事，给予读者想象的空间。

在这段歌册创造性写出来的历史中，民间话语形塑了英雄谢敬龙、恶官林大钦，呈现出地方宗族面对封建国家权力干涉时的焦虑、不满与反抗，但他们又对国家权力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民间话语的情绪似乎是矛盾的，但回望潮汕社会几百年来权力激荡的变迁历史，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去理解文本中民间话语所展现的反叛与依赖；《翁万达全歌》文本，恰恰提供这一段变迁历史中权力相互激荡的作用力场。

三、作用力场：权力的激荡及政治问题的悬置

文本形成以谢氏一族为代表的地方宗族和以国家管理人员为代表的封建国家权力文化关系。他们因不同目的开展行动，发出言语，封建国家明显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公堂、监狱等空间）对地方宗族社会进行控制，宗族为了生存有妥协、有反抗，而最后以宗族精英成员进入国家权力体系而实现双方共赢。故事文本提供文化关系演化的作用力场，使民间话语敢于反叛官方主流话语（颠覆林大钦的形象），再现文本生产时的历史环境，但这个作用力场对现实等级秩序的审视和反思是有限的，有关政治批判的话语被悬置了。

（一）文本写作背后的权力激荡

《翁万达全歌》故事文本作为作用力场，在于其透过历史地表，发出被官方主流话语遮蔽的声音。我们可以“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

程中积淀和形成的”^①。

潮汕地区典型的宗族社会随着 16 世纪上游沿江盆地和沿海平原的开发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东南地区经常受到倭寇的骚扰，宗族之间只好协力自保，大宗族带领其他小宗族抵御倭寇，继而发展壮大，在当地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②宗族自保获得生存虽是好事，但是地方势力一旦扩大，也给国家管理带来困难，如薛侃记载：

其初，乡人有不平，每每因小成大，皆由无事之先，罔有训诲，有争之际，乏人劝处，以至东起西灭，甲唱乙和，习嫌构怨，坐取倾覆。又官民势分悬隔，上德弗宣，下情罔达。奸民柔者唆讼，刚者凌制愚弱，武断乡曲。墨吏朋比，罗织为奸，穷乡细民，莫能自直者多矣。^③

宗族之间常因小嫌隙引发械斗分裂，又因为潮汕地区距离中央路途遥远，断层管理给当地秩序建设带来困难。在明代后期，以王源、薛侃、季本等士大夫为首，遵照朝廷诏令，在潮汕当地推行具有国家法律性质的乡约，并结合当地的情况改进乡约内容，用国家正统礼教去改造整个潮汕社会，同时也把潮汕地区纳入到国家的管理架构中。他们认为，用约定俗成的乡约，可以使地方宗族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以“礼”为核心的国家正统文化理念，默认国家中央对地方宗族的管理。如薛侃所制乡约图，规定召开宗族内部的仪式，需将皇帝的圣旨供奉在中间，县谕为右，申戒为左，再从尊到卑依次排列宗族内部人员，形成一套以封建国家为中心的礼法体系。^④

①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风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② 黄挺：《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③（明）薛侃著，陈椰编校，钱明主编：《薛侃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2页。

④（明）薛侃著，陈椰编校，钱明主编：《薛侃集》，第377—380页。

事实上，正如黄挺在《〈南赣乡约〉在潮州的施行》中所说：“国家正统文化的推行，对地方文化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入侵，它必然造成对地方社会权力的一定程度的篡夺，而引起地方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此，乡约在地方的推行并不能够一帆风顺”^①，当地社会一时难以适应国家正统礼法的推行，而为了更好地管理当地，封建国家通过让地方宗族的精英担任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等管理人员，下移部分管理权力，以他们为中介人介入基层管理。表面上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宗族共同管理当地，实则上，地方宗族活动需要遵照国家“礼”的秩序才能够取得合法性，宗族权力并非由祖宗血缘赋予，而是由封建国家权力赋予。

清朝初年，由于东南地区战乱形势更加严重，国家决定对沿海地区的人民进行迁海。此时通过明朝后期对潮汕地区的礼教管理，中央在地方上已然处于主导地位。在迁海过程中，不少潮汕宗族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尴尬情况，这种情况对整个宗族的延续无疑是致命打击^②，面临宗族解体，他们的心态是焦虑的，如《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外新溪黄氏家庙辟望世系族谱》就有“迨至康熙甲辰斥地迁民，流乱四方”^③的相关记载，宗族原先聚族而居，由于迁海政策，宗族中不同支系迁向不同的地区，虽然保存了原有的姓氏，但整体实力由于地区距离遭到了削弱，对内也不利于宗族凝聚、大事商议。封建国家权力对地方的管理，间接影响了地方宗族生存，使其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地方士绅对此是有认识的——在复界宗族的过程中，地方士绅需要转变自己的身份和职能，在管理地方的同时寻求自己宗族发展的途径。

① 黄挺：《〈南赣乡约〉在潮州的施行》，《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② 黄挺：《清初迁海事件中的潮州宗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③ 《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外新溪黄氏家庙辟望世系族谱》，第20页，转引自《清初迁海事件中的潮州宗族》。

如《仙都乡林氏族谱》记载清代林凤翥被官府举为乡约长，在重建地方秩序的过程中，他主持兴建三处林氏宗祠；为族中长辈挑选墓地时，林氏宗族受到邹堂人的阻挠，但他们最后得以为祖先择一处安息之地。^①

从明末到清代几百年，从《南赣乡约》的推行到迁海事件后宗族的复建，封建国家以当地士绅为中介人，将他们纳入国家管理体系，进一步管理潮汕当地的基层社会；在此过程中士绅作为基层管理人员，需要管理地方秩序；作为宗族一分子，需要考虑如何在封建国家权力的干预下发展自身宗族。林大钦单元故事的文本作用力场中，地方宗族和封建国家权力被符号化成不同的人物，重现明清潮汕社会里被官方主流话语掩盖的宗族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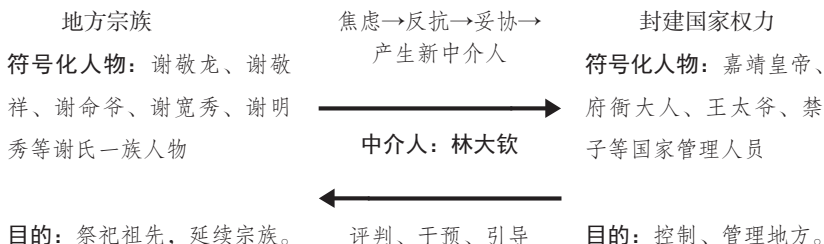


图1 《翁万达全歌》林大钦形象所在单元故事的权力激荡作用力场

谢命谷、谢宽秀、谢明秀等谢氏一族人物为了延续宗族血脉进行反抗，由于封建国家权力的强大，谢氏一族最后依靠谢敬龙、谢敬祥两位士绅的妥协和他们充当新的中介人（进入封建国家管理体系）获

^① 《仙都乡林氏族谱》，第16、22、68、72、110—112页，转引自《清初迁海事件中的潮州宗族》。

得生存和发展。嘉靖皇帝、府衙大人、王太爷、禁子等国家管理人员，代表着对地方宗族进行控制的封建国家权力符号，他们对地方宗族的行为进行评判（结局嘉靖皇帝将谢敬龙为了宗族痛打林大钦的行为评定为“贤孝”）、干预（府衙大人将谢敬龙收监，施以酷刑）和引导（王太爷在狱中引导谢敬龙需要参与考试，才能洗刷冤屈，保护宗族；禁子暗示谢敬祥需缴纳钱财才能够保全谢敬龙的性命）。这些符号化的人物行为看似无心，却构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权力体系，以宗族延续的愿望吸引着谢敬龙兄弟参加科举成为他们其中一员，进而控制、管理基层社会。

回到故事文本之外，现实中林大钦虽没有直接参与潮汕地区的管理，但作为已经考取仕途功名的士绅状元，他早已被符号化为封建国家权力的代言人，成为该作用力场中的关键性因素、中介人——考取功名后借由封建国家权力干预地方宗族生存，引发地方宗族的生存危机，将地方宗族和国家权力的符号连接起来，为民间话语的反抗情绪提供合乎情理的表达，引出后续权力激荡的故事。林大钦病死退场，并非符号所指的消失，而是符号能指所借助的身份产生了偏移——由谢敬龙兄弟代替他成为管理地方的宗族士绅，在文本潜在的发展空间里，封建国家权力又可以地方进行潜移默化的礼法秩序引导，进一步管理和控制地方宗族。

因此，在文本的作用力场中，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几百年中国家管理地方宗族的历史如何被民间吸收、理解、表达。被官方主流话语遮蔽的生存焦虑和无奈妥协情绪，都通过故事文本中地方宗族和封建国家权力的斗争进行符号化展现，再现历史语境。

（二）政治问题的悬置

《翁万达全歌》颠覆林大钦的故事，描述所谓过去，参与对政治权

力演化的反思，使文本获得作为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展现潮汕地区民间文学的魅力。但在故事最后，宗族及其内部精英通过妥协和成为新中介人获得生存；国家统治者不追究林大钦之死，实现对地方宗族的新一轮控制——这一对文化关系各让一步实现了双赢局面。同时，创作者将故事主题概括为“此是实事对人言，为善姓名万古香，做恶之人不久永，吾造歌文劝世人”的惩恶劝善观点，悬置对封建国家权力与地方宗族之间矛盾的直接讨论。

无独有偶，在《翁万达全歌》的另外一个故事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最后也以善恶之分进行概括。该故事的主人公翁万达同林大钦一样，在官方主流话语中，是一位坚毅勇猛的治边军事家，被称为“岭南第一名臣”。但《翁万达全歌》将其塑造成一位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小人，因为来自偏远的潮汕地区，翁万达被十八翰林耻笑——“众位翰林气昂昂，各自行开私自言：‘吾误乃是何等辈？粗言敢到只院中’”，只有来自同乡的林大钦对其恭敬。翁万达因十八翰林的嘲笑心生怨念，这为日后其借口征战沙陀怒斩十八翰林埋下了伏笔。翁万达杀死十八翰林后，有被杀翰林的儿子中进士，欲向翁万达的儿子翁国桢报父仇，最后被皇帝劝和。不平等尊卑秩序酿成的血海深仇被惩恶扬善的教育观念淡化、被大团圆结局所遮蔽。显然，在文本中，民间话语可以流露出面对封建国家干预的不满情绪，但叙事结构不能展现对这种生存威胁的绝对反抗。

在歌册的其他故事中，《吴忠恕》是地方宗族内部分成员反抗国家最后走向失败的叙事模式。歌册叙述咸丰年间潮州吴忠恕等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举义后兵败身死的故事，历史上确有其事。在文本中，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吴忠恕毅然举起义旗，并通过地方宗族的力量反抗清兵，最后同样参与反清活动的葱隍陈氏子弟被宗族内部剿灭处理，而其他起义力量被清兵借助神灵镇压。吴忠恕、和尚亮、陈阿十等起

义军，不同于《翁万达全歌》中谢敬龙等谢氏一族最后的妥协，他们对国家权威提出挑战，发起的“兄弟话相听”“禁淫人妻，禁乱抢物”“收人之所愿，不强迫”起义，皆被冠以恶行名目。^①他们或伏诛于封建国家士兵镇压，或惨死于宗族内部的尊卑教条，其中神灵相助、士绅协助封建国家统治、镇压等情节，更强化地方宗族要服从封建国家统治的教化意味。这意味着地方力量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反抗是徒劳的，只有进入国家管理体系，服从国家官方的秩序，才能达到双赢的和谐局面。

这种悬置政治立场的安排和地方挑战国家最终失败的叙事结构，源于歌册创作和出版的生态环境，我们需从明清时代地方书坊的出版自觉性来考察。诚如黄桂烽所言：“潮州歌册的作者在创作时，面临着一种由官方道德和民间道德斗争所引发的纠结、无奈和痛苦的情愫。”^②清中叶之后，潮汕地区的出版业有所发展，刊刻歌册的书坊具有一定规模，但仍受到官方禁毁政策的影响——歌册很少注明写作和刊刻年份，少有创作者会署上真名。歌册作为地方民间文学，本身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创作与出版的生态环境更是面临封建国家官方行政手段的干预，因此它的创作需要依附封建时代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做官方话语表达的代言人，才能保存和传播。于是，歌册同清中叶之后的大部分小说一样，注重对读者进行封建伦理教化：在结尾时，经常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并以此加上劝人向善、因果循环的话语。可见，民间话语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反叛意识有多么困难！因此《翁万达全

① 吴奎信：《潮州歌册〈吴忠恕〉的人民性和历史意义》，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编：《潮学研究（6）：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专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

② 黄桂烽：《制度化和民间化的伦理表达话语互动——“非改编系”潮州歌册中的民间信仰书写分析》，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歌》民间话语的表达，受制于官方既定的伦理道德约束，不得不“悬置”自己的政治立场，只能将民间的真实情绪悄悄掩盖起来，等待有心读者的发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漫长的潮汕社会演进中，地方宗族对封建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产生焦虑、不满，在这种民间情绪的带动下，民间话语颠覆了官方主流话语中的林大钦形象，将其塑造成自私蛮横、精于心计、虚伪残忍的中介人，为文本中民间力量的反叛提供导火索；又构想出谢敬龙这一敢于挑战尊卑秩序的宗族英雄，为地方宗族蛰伏的反抗情绪寻找爆发的合理出口。但由于歌册的创作和出版受制于文本外部封建国家权力的干涉，只能在文本内回避对政治问题的直接讨论，所以谢敬龙同时又是一个矛盾的英雄，他最后妥协进入封建国家管理体系寻求宗族的发展机遇，也证明民间话语表达的局限性。这种民间话语的流动特征恰恰是文本中地方宗族与封建国家权力演化在现实中的体现，同时也是文本隐含的政治问题影响现实中文学生产的结果。我们正是能在这种民间话语对历史人物形象的颠覆和对照中，透过历史的裂缝窥见被所谓“历史”掩盖的权力演化，听见来自民间的无声反抗。